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15期 2019年8月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二十年差异比较

■ 韩小龙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摘要：[**目的/意义**]现代图书馆理念传入中日两国的时间相近，但在两国不同国情和思考方式的影响下共同发展一个世纪之后，在很多方面出现较大差异。[**方法/过程**]从机构数量、藏书总量、从业人数、注册人数、购书经费5个方面对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自1997年至2016年的20年间发展情况进行可视化呈现，在人均方面及人均增速上展示相应年度变化图表。[**结果/结论**]通过经济与政策两方面的影响对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近20年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低迷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出5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差异比较 机构数量 藏书总量 从业人员 注册人数 购书经费
分类号：G251.4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15.005

1 引言

中日关系可谓一衣带水，自日本派遣唐使东渡(630年)至"黑船来航"事件(1853年)，期间1 200余年时间，日本几乎一直都在参考中国模式统治国家，直至明治维新时日本全盘西化，思想上"脱亚入欧"为止。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历史文化交流致使两国人民对于事物的思考方式仍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正是由于文化和思想上的相似性，才使得差异更加耐人寻味，在图书馆事业方面同样如此。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田中不二麿等人引入西方公共图书馆概念[1]，具备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籍馆"逐渐向现代公共图书馆形态转变。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已经可以比肩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起步稍晚，但由于历史原因，成长过程更为曲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快速发展，整体情况较日本来说还有较大差距。笔者将从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近20年的部分数据比较入手，分析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取其精华，不足之处引以为戒，期望能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更好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2 数据来源、指标解释、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

本文中中方公共图书馆事业历年数据均出自《中国图书馆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年鉴》是反映中国图书馆事业年度发展状况的大型资料工具书，现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其中公共图书馆部分的统计数据来自于文化部，准确性、可靠性与一致性得到了切实保证。《年鉴》中统计指标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同时对之前已有数据进行验证与修订。笔者在核对历版《年鉴》相应数据后，决定以2017年版《年鉴》中"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统计"数据为主[2]，空白年份数据由其他版本公布最新数据进行补充。

本文中日方公共图书馆事业历年数据均出自日本图书馆协会网站。该网站由日本图书馆协会(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主办，其专业性与权威性同样可以得到保证。其中"关于图书馆(図書館について)"一栏中公布有摘自《日本图书馆统计与目录》的相关数据，并在2013年后逐年公布1998年前的有关数据。笔者在核对历年数据后，将2018年公布数据作为日方主要数据来源[3]，空白年份数据由其他年度公布数据补充。

整体而言，在已公布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指标方面，《中国图书馆年鉴》比《日本图书馆统计与目录》更加丰富和全面。而由于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策略的区别，又使得双方统计项目不尽相同。如日方统计的"流动图书车""有资格的图书馆长"等项目是中方所未统计，而中方"组织讲座次数""举办展览数"等项目

作者简介：韩小龙(ORCID:0000-0001-7450-7427)，硕士研究生，E-mail:hanxiaolong@mail.las.ac.cn。
收稿日期:2018-12-05 修回日期:2019-04-06 本文起止页码:44-51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韩小龙.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二十年差异比较[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5):44 – 51.

又是日方所不具备。除此之外,在某些指标的统计方面,中日双方对其概念的界定有较大差异,如"流通"方面的统计,中方将其分为"总流通人次"和"书刊、文献外借册次",日方将其分为"个人借出""团体借出""预约件数"和"图书馆相互协力"4 个方面,各概念之间有所交叉但又不能完全包含。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笔者最终选定"机构数量、藏书总量、有资格的从业人员数量(以下简称从业人数)、持有图书证的注册人员数量(以下简称注册人数)、年度新增藏量购置费(以下简称购书经费)"5 项,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同时又具备相同或近似概念范围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在 5 项指标中,"机构数量"在中国指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的、免费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图书馆总数,含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在日本主要指由地方政府根据"图书馆法"建立的、由教育委员会管理的、由公共基金维护的、供所有居民免费使用的图书馆[4]总数,含都道府县立、市区立、町村立公共图书馆总数,历史上少量私人建立并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即私立公共图书馆,至 2016 年为 19 所)也在统计范围内。"藏书总量"在中国指公共图书馆内已编目的古籍、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料量之和;在日本指已登记的开、闭架文献资料数量之和。"从业人数"在中国指事业编制体制内图书管理员总数;在日本指在公共图书馆人事体制内专职人员总数(不含兼职、委托派遣等非体制内人员)。"注册人数"在中国指由公共图书馆发放的借书证总数;在日本指在公共图书馆登记的读者总数。"购书经费"在中国指由官方财政部门统一拨付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费中用于购入图书、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的费用;在日本方面指由官方财政部门统一拨付以及地方财团、民营企业投入的公立图书馆经费中属于资料费的部分,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已通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除此之外,文中凡涉及人均数量的计算,其人口总数均来自官方公布数据,中国方面的数据采集自中国国家统计局[5],日本方面的数据采集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6]。

2.2 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

笔者借助 Excel、SPSS 等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检索结果分析,以统计学分析方法对 1997 – 2016 年间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机构数量、藏书总量、从业人数、注册人数、购书经费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对两国人均和人均增速进行可视化图表呈现,将最近 20 年间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整体变化情况展示给读者。

3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20 年基本数据统计

3.1 基本情况

在自 1997 年至 2016 年的 20 年中,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从 2 628 个增长到 3 153 个,增加了 525 个,增长率为 19.98%,日本拥有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从 2 450个增长到 3 280 个,增加了 830 个,增长率为 33.88%。在同样的年份,在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从业人数、注册人数、购书经费 4 个方面,各有不同的变化。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公共图书馆 20 年变化

项目 年份	藏书总量(万册)	从业人数(人)	注册人数(万人)	购书经费(万元)
1997	37 549	47 882	556	25 527
2016	90 163	57 208	5 593	216 020

注:数据统计时间截止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藏书总量、从业人数、注册人数、购书经费 4 个方面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分别为 52 614 万册、9 326 人、5 037 万人、190 493 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140.12%、19.48%、905.94%、746.24%。除官方编制从业人数外,皆有数倍甚至近十倍的增长。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人们文化需求的增长,使得人们对于书籍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进而不断促进了作为大众教育途径之一的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与经费的不断增长。而与此相对照,日本在这些方面的变化却有不同。如表 2 所示:

表 2 日本公共图书馆 20 年变化

项目 年份	藏书总量(万册)	从业人数(人)	注册人数(万人)	购书经费(万元)
1997	24 965	15 474	3 061	249 455
2016	43 696	10 443	5 951	174 069

注:日方年度购书经费已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汇率换算为人民币,下同

在这 20 年中,日本公共图书馆在藏书总量、从业人数、注册人数、购书经费 4 个方面的增长量分别为 18 731万册、-5 031 人、2 890 万人、-75 386 万元,增速分别为 75.03%、-32.51%、94.41%、-30.22%。

相对而言,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国力飞速发展,作为基础公共设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也在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得到

了巨大的发展。在 20 世纪末,日本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规模已经基本成型,增长速度相对稳定,藏书总量和注册人数方面均有一定程度增长,但由于受到经济和政策的影响,在从业人数和购书经费方面有较大下降,笔者将在第 4 章对此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3.2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五项指标及人均情况可视化对比

两国公共图书馆 20 年变化除上表所示外,各年份总量变化、人均变化与增速情况也不尽相同。2016 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量为 0.022 8 个,与 1997 年的 0.021 3 个相比只增加了 0.001 5 个,增幅为 6.58%。在年度人均增速上除 2011 年、2012 年有较大增长外(分别为 1.87% 和 3.69%),基本维持在 -1% 至 1% 之间。反观日本,2016 年人均拥有量为 0.258 4 个,比 1997 年的 0.194 3 个增加了 0.064 1 个,增长率为 32.99%,每年增长速度都在 0 至 5% 之间,近年来稍有放缓。两国公共图书馆机构总量、人均拥有量、人均拥有量增速年度变化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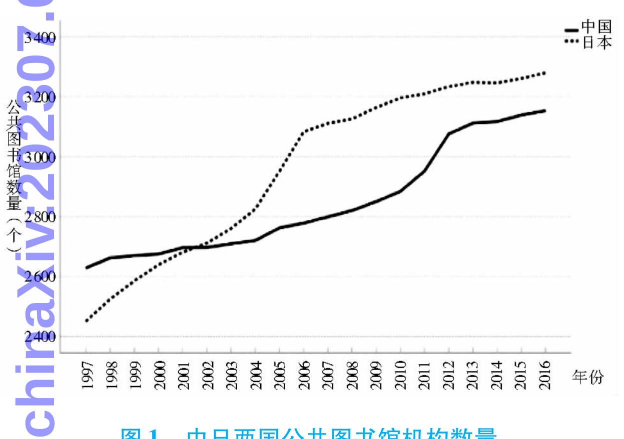


图 1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机构数量(1997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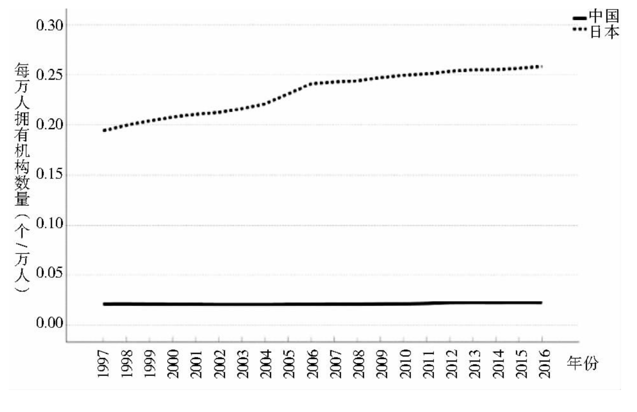


图 2　中日两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量(1997 -2016 年)

在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方面,中国从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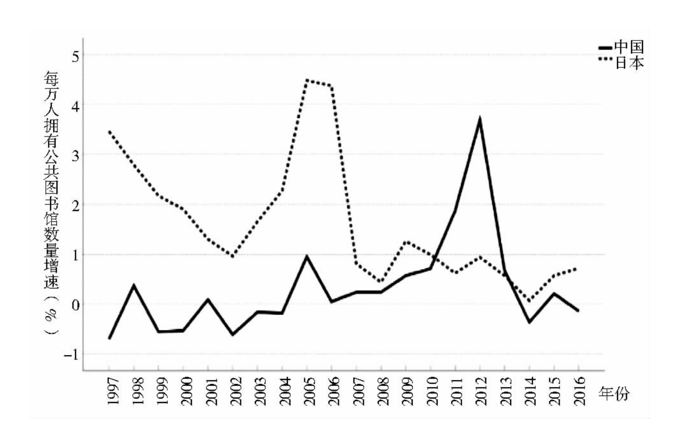


图 3　中日两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量增速(1997 -2016 年)

年的 0.303 7 本/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0.652 1 本/人,增加了一倍多,日本则从 1.979 6 本/人增加到 3.442 5 本/人,增长了 7 成有余。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年增长速度相对稳定,且呈总体下降的趋势,而中国的年增长速度则忽上忽下,变化较大。两国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人均拥有量、人均拥有量增速年度变化如图 4、图 5、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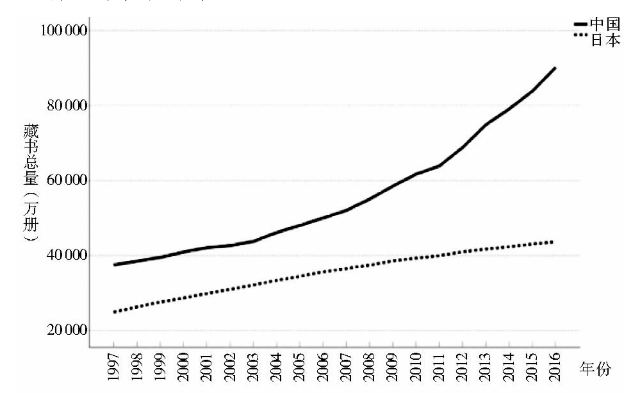


图 4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馆藏总量(1997 -2016 年)

在公共图书馆官方登记有资格的从业人数方面,上文已经提到过我国的发展趋势是总体稳步上升,日本逐年下降。从人均方面来看,同样如此。2016 年中国每万人拥有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数量为 0.413 7 名/万人,比 1997 年的 0.387 3 增加了 0.026 4,增速为 6.82%,日本从 1997 年的 1.227 0 下降到 2016 年的 0.822 7,减少了 0.404 3,增速为 -32.95%。两国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每万人均拥有从业人员数量、万人拥有量增速年度变化见图 7、图 8、图 9。

在人均拥有借书证数量方面,中国自 1997 年的 0.004 5个/人增长到 2016 年的 0.040 4 个/人,增加了 0.035 9,增速达到惊人的 797.77%。日本从 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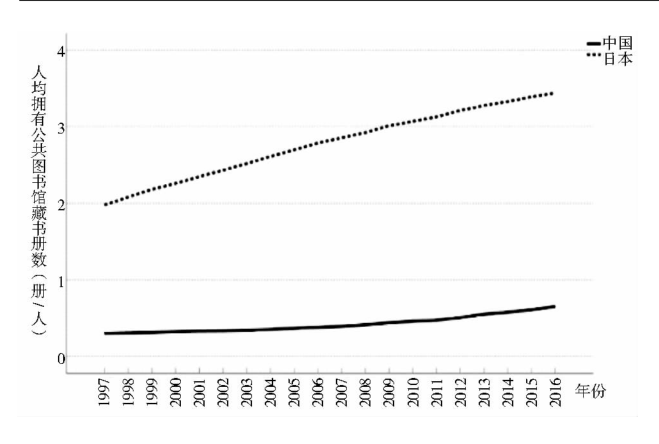


图 5　中日两国每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馆藏量（1997－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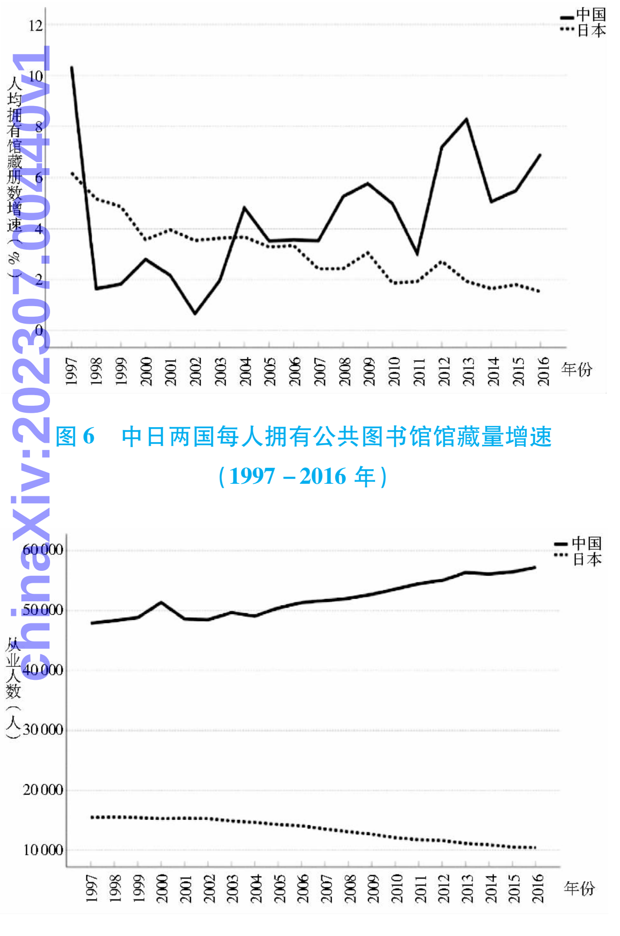


图 6　中日两国每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馆藏量增速（1997－2016 年）

图 7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1997－2016 年）

的 0. 242 7 个/人增加到 0. 453 1 个/人，增长了 0. 210 4。单纯从数字上来看，日本增速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数据比例所反映的情况却是日本已经基本达到了每两人就有一本借书证的程度。两国公共图书馆持有借书证人员数量、人均借书证持有量、人均借书证持有量增速年度变化见图 10、图 11、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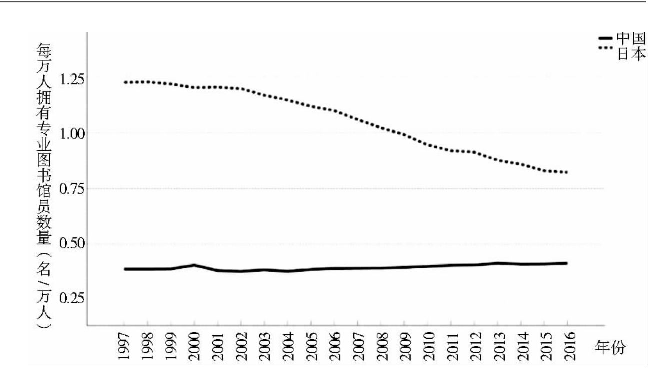


图 8　中日两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1997－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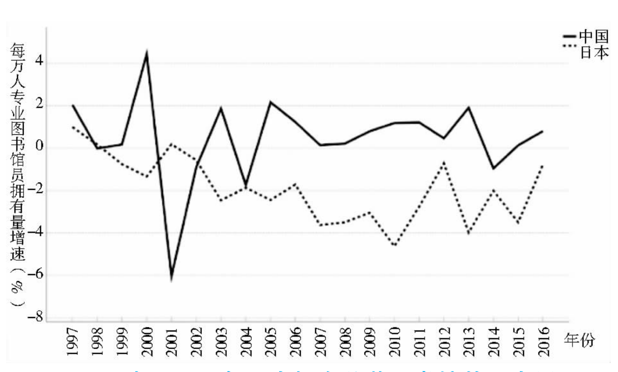


图 9　中日两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增速（1997－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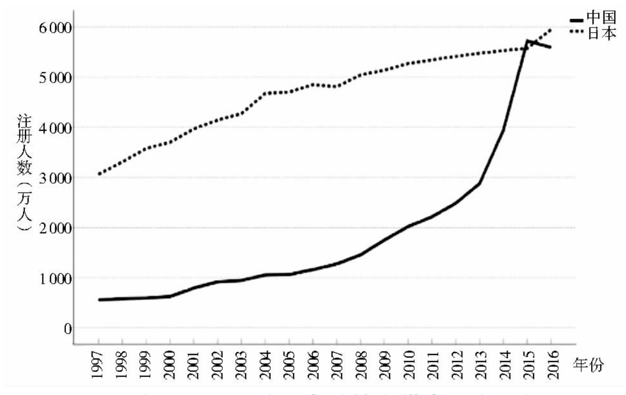


图 10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持有借书证人员数量（1997－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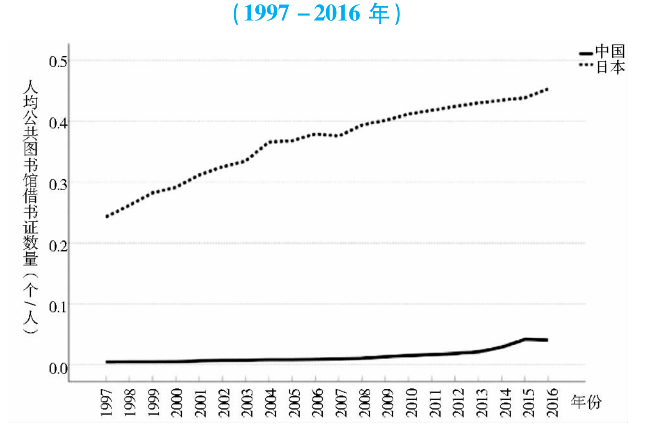


图 11　中日两国人均借书证持有量（1997－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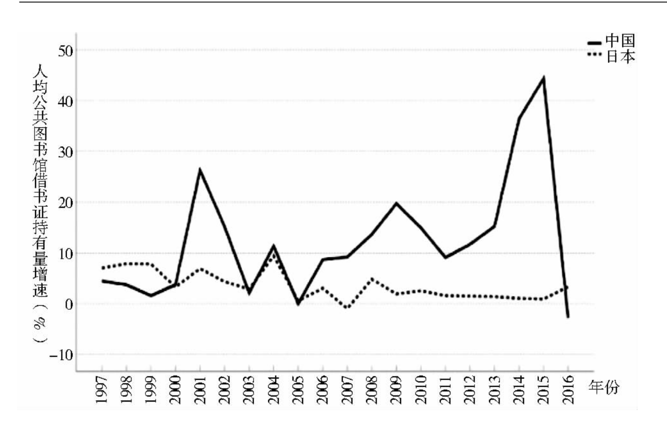


图 12　中日两国人均借书证持有量增速（1997 –2016 年）

从人均拥有新增馆藏购置费方面来说，中国由 1997 年的人均 0.206 5 元到 2016 年的人均 1.562 3 元增加了 1.355 8 元，增长了 6 倍多，除 2001 年外，皆为正增长。日本从人均 19.780 7 元下降为 13.713 8 元，减少了 6.066 9 元，增速为 –30.67%，多数年份为负增长。两国公共图书馆年度新增藏量购置费、人均年度购书经费、人均年度购书经费增速年度变化如图 13、图 14、图 1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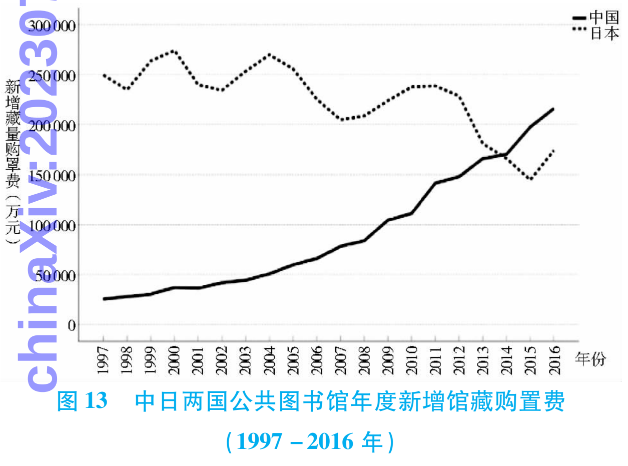


图 13　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年度新增馆藏购置费（1997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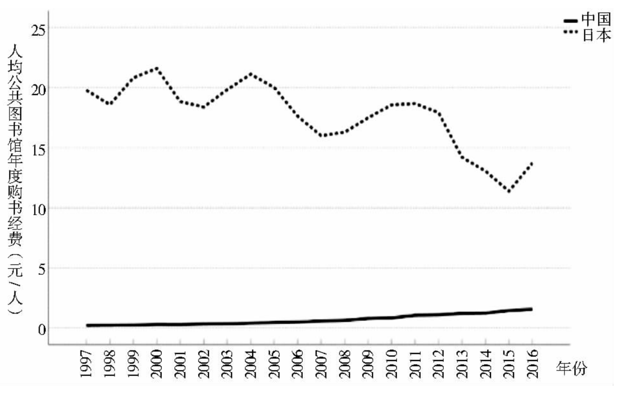


图 14　中日两国人均年度购书经费（1997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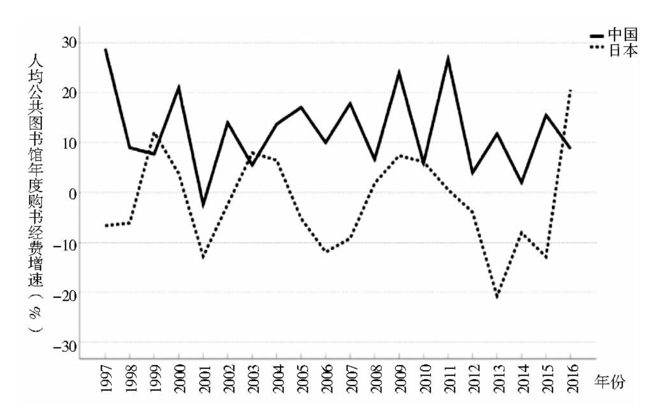


图 15　中日两国人均年度购书经费增速（1997 –2016 年）

4　中日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差异主要原因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公共图书馆界开始全面接触西方现代图书馆的技术手段方法，并配合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形成了自身的发展思路[7]。在此过程中，有关部委、地方政府、相关学协会形成了大量条例规定与指导性文件，图书馆学教育也进入提高阶段[8]，可以说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已经全面铺开。从数据上来看，文章中涉及的 5 个方面除从业人员外整体上均有较大增长，人均方面均稳中有进。反观日本方面，在 20 世纪后半段，受第一次石油危机、泡沫经济崩溃、美日贸易争端等多重打击，日本经济从高速发展转为低速增长再到长期低迷，至今已有约 30 年时间。期间国内大量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发展停滞，作为文化公共设施的公共图书馆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即便有学者呼吁图书馆与学校、博物馆等机构一样具备教育功能，有别于一般的公共设施，但实际上并没有阻止政府对公共图书馆扶持经费的削减[9]。同样作为公共图书馆重要经费来源之一的国库补助金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渐缩减直至废除，迫使公共图书馆不得不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经费支持。而同时期的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之后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经过 40 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与国民生活水平已今非昔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统计[10]，自 1987 年至 2016 年，中国 GDP 从 0.33 万亿美元增长到 11.21 万亿美元，增长率高达 3 296.97%，而同时期日本 GDP 增长率仅有 96.41%。尽管中国国内公共图书馆发展速度尚未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但是经济的增长无疑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11]，同时，公共图书馆的部分市场化运作项

目也为图书馆带来了多样的资金来源,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可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一定帮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经济发展的停滞,日本方面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制度用以分担政府在公共图书馆领域所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在2000年后,日本逐步引入欧美地区公私合作概念,参照英国1980年面对巨额财政赤字的威胁时所采取的PFI政策,调整原有"管理委托制度",形成了针对国内公共服务领域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同时修改《地方自治法》中相应规定,将公共图书馆全面引向由私营企业负责管理的社会化运营[12]。这一政策的初衷是想借助私营企业和地方财团的雄厚实力挽救公共图书馆发展面临的尴尬境地,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寻找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契机,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13]。首先在政策推行方面,公共图书馆和地方自治团体配合并不积极,以日本图书馆协会的调查统计数据[14]来看,截至2017年,全国公立图书馆实际引进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共计551家,仅占当年全国公立图书馆数量的16.80%,可见这一政策的推行效果极其有限。其次在该政策实施之后,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诸多争议。从本文第3章的统计情况来看,受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从业人员数量和新增藏量购置费的持续下降。由于公立图书馆转向社会化运营,"商人逐利"的本质属性逐渐显现。图书馆行业的特点决定其在短时间内难以获得收益,在维持馆舍运营的前提下,缩减经费成为指定管理者的首选。其中受到直接影响的是购书经费的缩减,从表2可以看出,1997年至2016年的20年间,由于国库补助金的废除和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影响,新增藏量购置费减少了30.22%。在购书经费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新增图书的数量和质量不会下降,这也是经费缩减带来的第一个间接影响。但是图5显示人均馆藏拥有量不降反升,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增藏量购置费只是削减而并非废止,另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与日本国民数量增速过慢不无关系。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来看,1997年日本国民总数为12 617万[15],2016年为12 693万[6],仅增长了0.60%。因此,在馆藏总量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即便购书经费缩减,人均图书拥有量也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而经费缩减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同时也是节省经费开支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则是削减人员开支[16]。削减人员开支的主要做法是在减少体制内专职人员招募的同时,大量雇佣兼职、委托派遣人员,低工资成为雇佣标准[12]。据日本图书馆协会的统计[17],至2015年,兼职人员数量已达16 622人,比1997年增长了近10 000人,仅增长人数已经接近同年专职人员数量,另外还有一万余名委托派遣人员已经进馆工作,非专业人员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机构内整体专业水准的降低,一方面影响职员工作热情的同时诱发员工离职,另一方面引发民众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专业性的质疑并导致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社会地位的降低,也是正式职员数量除自然减少(指退休、死亡等自然因素)外的一大原因。

综上所述,中日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最近20年发展上表现出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方面的影响,即在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经济形势越好,国民文化需求就越高,国家政策就会产生相应倾斜,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会持续稳定上扬;反之,国家经济形势不振,即便国民文化需求仍在高位,相关政策的实施也难以得到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就会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所谓"规律"的存在,面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颓势,日本政府即便在2008年之后相继出台一系列振兴政策,如"国民读书年"、《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图书馆司书专业研修援助等。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由于日本国内整体经济形势的萎靡和公共图书馆业界大环境的恶化,这些政策所能起到的效果还非常有限,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复苏依然遥遥无期。

5 近20年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5个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总量上与早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的日本差距正在一步步缩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来看,不久的将来我国就能实现对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全面超越。但仅管如此,作为老牌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强国,日本在诸多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依然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1)若要保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必须要有一系列合理完善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作为保障。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其能够在充分学习和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形成一套适合国内发展状况和国民需求的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并且可以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与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动态适时做出调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战后"图书馆三法"(即《国立国会图书馆法》《图书馆法》《学校图书馆

法》)的颁布[18]。三法构成了日本图书馆界法律法规体系的主要框架,从根本上树立了图书馆的运营管理等各项制度[19],确立了普遍服务意识观念,明确了图书馆在教育事业中的地位[20],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和实施大众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已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十九大之后通过的第一批法律,对文化界与图书馆界均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21]。就该法本身来看,条文中对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服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有所涉及[22],在明确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的同时,也为今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方法和路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实施的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与相应的行业标准也应尽快完善。只有相关条令条例相对完备,行业内才能真正形成"事事有法可依"的局面,并在法律约束下形成一整套涉及人员素养、职业道德、评价指标等方面的业内规范。

(2)加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提高公共图书馆从业者待遇与职业认同感。日本近20年推行指定管理者制度,实施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专业从业人员的流失,间接导致图书馆服务专业性的下降,引发普通民众对公共图书馆认可度的下降。新进员工多为非图书馆专业人员,缺乏必要的系统性教育与知识储备,难以为民众提供良好专业服务的同时,引发公众对图书馆产生误解,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进一步引发图书馆学教育的困境。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正处在上升期,各地发展情况尚不均衡,参考国内对于图书馆从业人员制定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23]和《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24]等行业规定,我国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内还存在大量的缺编状态[25],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图书馆专业人才数量不足、薪资待遇较低、专业人员职业认同感差等现状。对此应在加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同时,加深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教育,并提高政府部门与普通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提升从业人员薪资福利,以促进专业人才的涌入。

(3)树立大众服务观念。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在偏远地区建馆有一定困难,同时图书利用率也难以得到保证,这一点与我国部分地区有相似之处。但是战后日本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初就提出了"与普通市民相适应的服务"这一理念[19],以至于在经济飞速发展期间,建立了大量市町村立图书馆,在推行总分馆制度的同时,投入了大量流动图书车[17],尽可能引导国民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国民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认可。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为精英服务的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转变,大量基层单位和偏远地区仍然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知识服务。对于这一点,国内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界应当尽快改变认识,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视提升公民文化素质为己任,为我国早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

(4)加大公共事业扶持力度。从最近20年中日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对比来看,没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必然陷入停滞,甚至会为了寻找出路而"病急乱投医"。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就十七大之后的10年的时间来看,所增加的公共图书馆数量也不过300余座,3 000余座图书馆的总量与我国的大国体量着实不太匹配,正如前文提到的,我国尚未形成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模。针对这一点,建议政府部门应该考虑加大对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事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文化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全民早日享受到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吸取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教训,谨慎对待市场化项目。日本近20年推行的社会化运营从根本上看是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的无奈之举,从推行效果上来看也并不理想。回归到事件本身,造成这一问题的最初原因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现阶段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我国一致对外释放友好信号,但无法阻止老牌列强的虎视眈眈。自2018年始,中美之间频频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制裁中国的手段与当初对付日本时如出一辙。我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化体系,面对这一问题时并不会像日本一样被当"软柿子"捏,但仍需做好一切应对准备,包括可能产生的经济发展降速问题。我国公共图书馆界在此时更应有清醒的认识,一旦经济发展受挫,势必会影响到财政部门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力度,届时需要牢牢把握立馆之本,全面吸取发达国家在公共图书馆事业社会化运营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谨慎考虑项目市场化运作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做好做强自身的同时,发挥好作为全民知识库和国家智囊的价值与作用,成为我国在应对国际局势时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

[1] 吴建中. 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J]. 图书馆学研究,1986(1):67-70.

[2]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年鉴2017[M]. 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470－543.

[3] 日本図書館協会. 日本の図書館統計[EB/OL]. [2018－10－15]. http://www.jla.or.jp/library/statistics/tabid/94/Default.aspx.

[4] 日本図書館協会. 公立図書館の任務と目標[EB/OL]. [2018－10－15]. http://www.jla.or.jp/library/gudeline/tabid/236/Default.aspx.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总人口[EB/OL]. [2018－10－15].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 = C01&zb = A0301&sj = 2018.

[6] 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平成 29 年人口推計[EB/OL]. [2018－10－15]. 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2017np/index.html.

[7] 范兴坤. 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D]. 南京:南京大学,2010.

[8] 王知津,徐芳,潘永超,等.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三十年(1978－2008)回顾与展望[J]. 图书与情报, 2010(2):23－30.

[9] 曹磊.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发展历程及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3):119－131.

[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EB/OL]. [2018－10－15].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

[11] 彭继玉. 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7):30－33.

[12] 沈丽云. 日本图书馆概论[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70－71,79.

[13] 高鍬裕樹. 指定管理者制度の問題点について:箕面市図書館協議会での議論のなかから[J]. 生涯教育学・図書館情報学研究, 2007 (6) :81－88.

[14] 日本図書館協会の取組み. 指定管理者制度導入 2018 調査(報告)および別表. [2018－10－15]. http://www.jla.or.jp/Portals/0/images/committe/toriku-mi/sitei2018.pdf.

[15] 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各年 10 月 1 日現在人口[EB/OL]. [2018－10－15]. 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 page = 1&layout = d - atalist&toukei = 00200524&tstat = 000000090001&cycle = 7&tclass1 = 000001011679&second2 = 1.

[16] 安藤友張. 公立図書館経営における指定管理者制度導入に関する現状調査[J]. 日本図書館情報学会誌, 2008, 54 (4) : 253－269.

[17] 日本の公共図書館統計[EB/OL]. [2018－10－15]. http://www.jla.or.jp/Portals/0/data/iinkai/% E5% 9B% B3% E6% 9B% B8% E9% A4% A8% E8% AA% BF% E6% 9F% B -% E4% BA% 8B% E6% A5% AD% E5% A7% 94% E5% 93% A1% E4% BC% 9A/toukei/% E5% 85% AC% E5% 85% B1% E9% 9B% 86% E8% A8% 88% 202017.pdf.

[18] 李易宁. 日本公共图书馆法规体系的构建历程(1899－1970)[J]. 图书馆,2018(3):9－14.

[19] 李国新. 日本公共图书馆立法[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2):75－82.

[20] 塩見昇. 新教育基本法と図書館法改正[J]. 図書館界, 2008, 60(3):180－189.

[21] 卢云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现实价值及立法启示[J]. 图书馆建设,2018(2):17－22.

[2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 [2017－11－04].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27.htm.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Z]. 1982－12－01.

[24]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 28220－2011.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EB/OL]. [2017－11－04]. 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 = online&hcno = 6ECDC3A0A8D2237C20565737620DFE86.

[25] 翟建雄,邓茜. 中外公共图书馆人员编制标准比较研究[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6):6－1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Public Librar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Han Xiaolong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ncept of modern librar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Japan at similar times, but after a century of comm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ere have been great differences in many aspect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visua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years of 1997 to 2016 in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the total number of book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persons, and the cost of purchasing books. The corresponding annual change chart was displayed on the per capita growth rate. [**Result/conclusion**]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economy and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and Japan, especially for Japan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put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Keywords: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difference comparison number of institutions total amount of books practitioners number of registrants purchase of books